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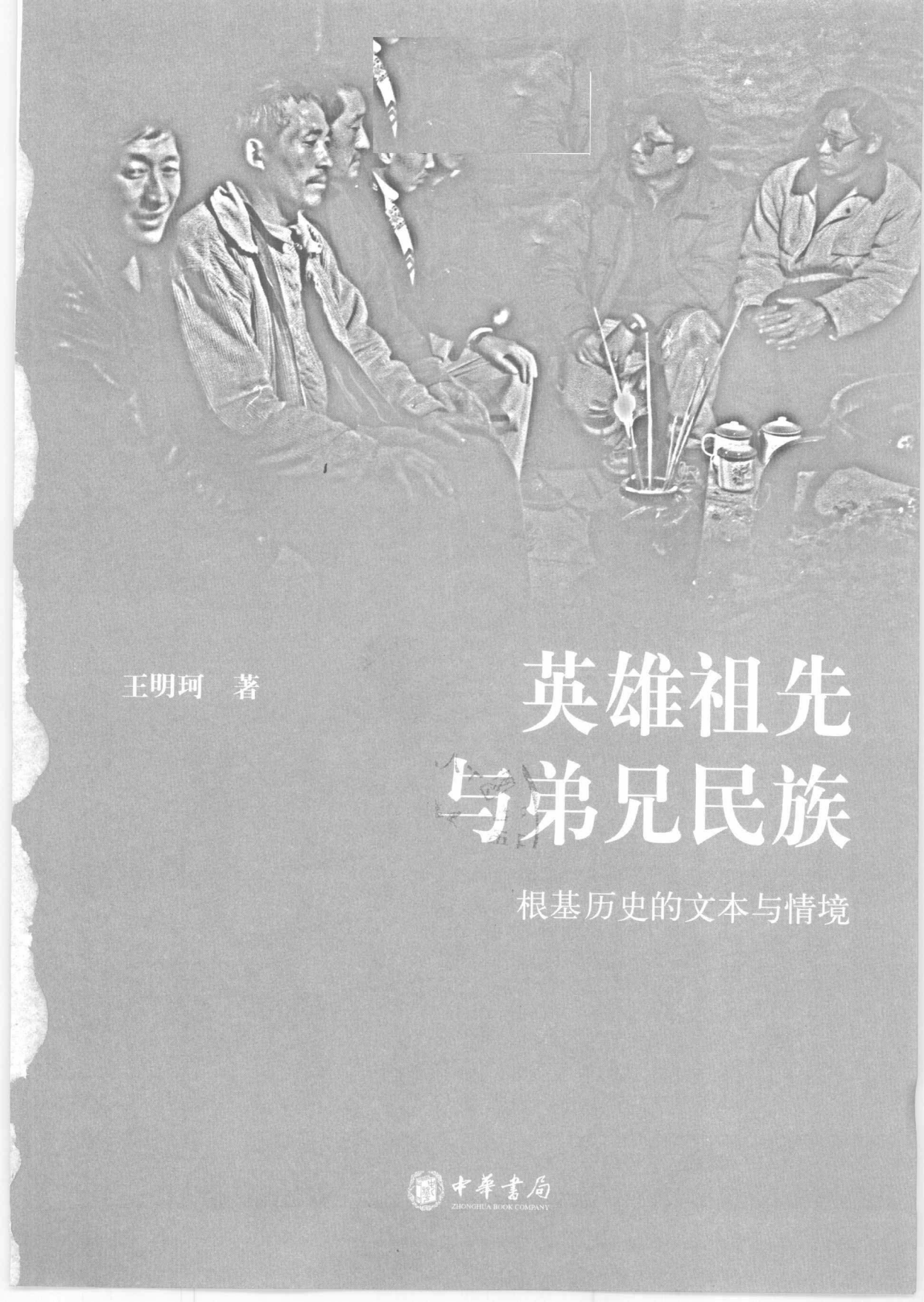
王明珂 著

英雄祖先 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明珂 著

英雄祖先 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王明珂
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9.7
ISBN 978-7-101-06282-3

I. 英… II. 王…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 中国②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911 号

书 名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著 者	王明珂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½ 插页 6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282-3
定 价	39.00 元

隐藏的景(简体版自序)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是我关于中国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与我过去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皆有密切关系与延续性。对《华夏边缘》来说，这本书可称是其续篇，更具理论与体系地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区域人群经由历史互动，而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格局的过程。对《羌在汉藏之间》来说，本书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之后，我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作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物，以此解释“炎黄子孙”与“弟兄民族”的深层历史意义。《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而本书则是化熟悉为陌生，经由此过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

因此，这本书是新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构，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因其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与现在间的断裂，因而也对政治社会现实常采批判与解构观点。至于解构之后如何再造社会现实，或如何促进国家、民族、阶级、性别与文化人群间的和谐

相处,并不在其考虑之列。相反地,反思研究着重在历史变迁与相关历史记忆中了解当代情境:一方面解释当代情境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在与过去之比较中理解当代情境。反思性研究强调对外在的、边缘的、陌生的现象与体系,作深入的文本与表征分析以产生认知(化陌生为熟悉),同时藉此认知,在同一套文本与表征分析逻辑下,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作新的体认与了解(化熟悉为陌生)。此种新的反思知识能让人们对当代有不偏倚的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处境,因此得以珍惜及有思改进现实,以促进各种社会人群之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后现代研究解构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反思性研究则不争论历史事实;它从历史记忆角度尝试探索古今历史叙事与记忆中“隐藏的景”,也就是尝试了解留下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

对我以及对读者而言,思考这些问题,也是一个走入我们文化心性中自身难以察觉的异域之旅。与炎黄子孙、弟兄民族相关的历史记忆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词,在近代新知下常被视为过气的民族团结话语,然而在本书中我将发掘其中“隐藏的景”,赋予它们深刻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也由此体会那埋藏在我们文化深处的历史心性,与由此产生的历史叙事以及人们叙说这些历史时的情感与意图。

石明河

序于南港,2007

原序与谢词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炎黄子孙”的汉系中国人，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弟兄民族”这一称谓的新理解。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解构”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相反地，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历史新知，更能够促进“炎黄子孙”及其“弟兄民族”间的和谐与凝聚。

人们常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与黄帝，三百四十多年前到台湾的郑成功及其随从军民，以及在美国，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英雄祖先们。人们也争论这些英雄历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亚伯拉罕，究竟是哪一“民族”的英雄祖先，他们所建立的“国”地理空间包括哪些地方。强调这些“英雄祖先历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为他们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后代，或竟为被征服者的后裔。坚持与争议这些“英雄祖先历史”，以及此“历史”所支持的资源范畴与边界，也经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国家

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些被强调、争议的“历史”都起始于一些“英雄祖先”。然而另有一些起始于“弟兄祖先”的“历史”,被人们忽略、埋没。因为相对于服膺“英雄祖先历史”之人群而言,主张这些“历史”的族群多半是居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因而在“英雄”成为“历史”叙事中的主角后,他们所宣称的“历史”被认为是传说、神话。

当代历史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常批评单一、典范与线性的历史,强调历史有多元的声音。然而这样多元、多线的历史,经常仍是对“过去”的选择性建构,或为对“过去”众声杂沓的争鸣,而未见及“历史”与人类社会间巧妙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批评单一的线性历史,解构某种体制与认同下的典范历史,如此,学者——在对自身的文化与学科偏见与相关优势权力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解构性知识”常为对他者的侵犯与侮辱。无论如何,在各种权力主体以“历史”相互解构中,边缘的“历史”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历史”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历史”仍是“历史”,“神话传说”仍为“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历史”所塑造的社会情境。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曾说明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为一种“历史”,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历史心性”所产生之“历史”,这是“将陌生的化为熟悉”。基于此,在这一本书中我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献中各种“英雄祖先历史”,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在此新知下可能反变得陌生。因而这本书的工作可说是“将熟悉的化为陌生”。希望读者与我一同由了解当今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出发,由此我们重新思考三千余年来曾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许多“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国语》中“炎帝、黄帝为两弟兄”之说。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传述这些“历史”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诉说此“历史”时人们所表达的期望与情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同再思考我们所熟悉的“英雄祖先历史”,特别是“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之历史;将它们视为另一种“历史心性”的产物,尝试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境中书写与诉说这些“历史”,以及人们宣称此

种“历史”时所流露的情感与意图。如此,在同一认知平面上思考“历史”与“神话传说”,我们才能对黄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历史”有反思性的认知,也能对许多“神话传说”——特别是“弟兄祖先故事”——有真正的体会与了解。

相信如此的“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①,可以让宣称自身为黄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英雄祖先”后裔的族群,能认识自身此种历史记忆的深层意义及其历史过程,以及我们的先人在宣称或接受这些“英雄祖先历史”时的骄傲、期望,或卑屈与无奈。我们更应认识,“弟兄祖先故事”事实上可能是一种更古老、更普遍的“历史”(但显然不若男性中心主义古老),曾广泛流行于华夏之域及其邻近各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古代华夏曾称“炎帝与黄帝为弟兄”,彝族说最早“彝、汉、藏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于“六弟兄”之说,都是此种“历史”。我们也能由此体认,“弟兄民族”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历史”(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反省并思索调整改进民族或国族内外的族群关系。

中国人常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而自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而更应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表述的“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民族神话传说”的那些记忆。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与社会认同“框架”(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如 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 *unthought categories*

① 关于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与解构式知识(deconstructive knowledge),我引申自 Kamala Visweswaran 所称的 reflexive ethnography 与 deconstructive ethnography 之区分。我也同意其见解:反思与解构的不同是,“解构”破坏被观察、描述者的主体性,而“反思”则保全、维护其主体性。见 Kamala Visweswaran,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of thought)^①,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历史”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

这本书的重要主题与部分内容,曾在多个学术场合发表。我将“弟兄祖先故事”视为一种“历史”,以及借此提出的“根基历史”概念,最早发表于黄应贵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时间、历史与记忆》中^②。对“历史心性”较初期的见解,出于2000年底我在四川大学的一场演讲,后来演讲内容曾改写发表于《历史研究》^③。以羌族之“弟兄祖先故事”为基础,对“历史心性”更完整的论述见于2003年之拙著《羌在汉藏之间》。有关“黄帝后裔”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发展,曾在2002年以论文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④。将箕子、太伯等历史记忆视为一种“英雄徙边记”模式化情节之产物,最早的构想发表于2004年在韩国汉阳大学举行的“Border or Frontiers”国际研讨会中。“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生的英雄历史记忆在华夏边缘所造成的历史心性与记忆变化,也发表于2004年“第一届北京论坛国际会议”之会议论文中。将“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节”视为三种历史叙事文化中的“结构”,类似观点曾在2004—2005年发表于《历史人类学集刊》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两篇论文中^⑤。对“历史心性”与“文类”的理论性探讨,也曾于200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马长寿先生纪念讲座”

①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p. 40.

② 黄应贵主编:《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页283—341。

③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页136—147。

④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本3分,2002,页583—624。

⑤ 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历史人类学集刊》2卷1期,2004,页51—88;王明珂:《“惊人考古发现”的历史知识考古:兼论历史叙事中的结构与符号》,《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6本4分,2005,页569—624。

上发表。此外,2004年我曾在以下这些大学与研究机构,发表与此著作相关的演讲:武汉大学历史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以及台湾的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记忆与认同工作坊”、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等。在以上这些会议、期刊与演讲的发表中,我都获得许多学者、听众、评论人、审查人的建议与批评,在此我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与指教。我也要感谢2004年下半年,听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反思史学:文本分析”的学生们,我许多关于反思史学的概念,都在准备此课及课堂上与学生们的讨论中得以厘清。

2005年承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及哈佛燕京学社协助,我得以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并完成此书;我要感谢哈佛大学 Peter Bol 教授及杜维明教授的帮忙。在此期间,我也得以在纽约州 Cornell University 人类学系的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Colloquium Series,在芝加哥的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之人文中心(Alice Berline Kaplan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及艺术史系(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发表与此书相关的演讲,得到许多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包括讨论人 Prasenjit Duara 教授——的建议与回应。我在此也感谢邀请我前往并与我讨论相关议题的 Magnus Fiskesjo、Sarah E. Fraser 教授与 Duara 教授。

与本书相关的田野与文献研究,曾得到台湾中研院“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题计划(2001—2002)、“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中国近代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以炎黄记忆为例”(2002—2003),以及“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英雄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2002—2004)之支持才得以完成。我对以上机构,以及在这些计划中的合作学者,致上诚挚的感谢。特别是王士元院士,他有关中国民族起源的宏观见解,对我完成此书很有启发。而他嘱我共同将“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题计划成果集结成书之事,我却一直无法完成,在此我也要向王院士致歉。

在最近四年里,与本书有关的研究曾以英文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我的朋友

Robert W. Cribbs 不仅替我订正这些英文写作,也常质疑并与我争辩这些论文的内容。这些研究涉及到“反思性”,因此一位全然不懂中文、不熟悉人类学或历史学的质疑者对我常有意想不到的启发——这也证明了我们常沉浸于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化与学术符号体系中而不自觉,此不自觉也如 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 *collective scientific unconscious*。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于清沼,在我奔波于田野与其他学术活动或有时经历困顿与挫折之时,她是我最有力的支持者。

目 录

原序与谢词	1
前言: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	1
一 中原核心、多元一体、想像社群	2
二 本书主旨与研究方法	8
第一章 边缘与异例	19
一 边缘异例	19
二 弟兄祖先故事	21
三 历史心性	27
第二章 英雄祖先历史与华夏意识初萌	31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土高原边缘的人类生态变迁	32
二 商、周王朝出现的人类生态意义	34
三 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出现	38
四 凝聚华夏的各种“根基历史”方案	43
五 黄帝与炎帝:弟兄或敌手	46
六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黄帝	47
第三章 《史记》文本与华夏帝国情境	49
一 《史记》中的黄帝:血缘、空间、时间与政治权力	49
二 《史记》中的黄帝子孙	51
三 “正史”与华夏帝国:文类与社会本相	55
第四章 蜀之华夏化与方志文类	59
一 典范中国史中的古蜀历史	60
二 被遗忘的“过去”——三星堆文化	61
三 历史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解释	64

四	汉晋蜀人对“过去”的失忆	66
五	蜀人成为黄帝子孙	68
六	被遗忘的历史心性	71
七	“方志”文类的出现及其意义	72
第五章	英雄徙边记:边疆史的模式化情节	77
一	正史中的四种“英雄徙边记”文本	79
二	“英雄徙边记”文本分析	83
三	“英雄徙边记”与华夏边缘	87
第六章	反思英雄徙边记:朝鲜与东吴	95
一	反思性	96
二	东北边缘:箕子、朱蒙与檀君	98
三	神话与历史	99
四	高丽之本土历史建构	102
五	东南边缘:太伯成为本土英雄祖先	110
第七章	反思英雄徙边记:滇与西羌	119
一	西南边缘:庄蹻记忆被忽略及再唤起	120
二	沙壹与竹王	121
三	佛僧与祖先:《南诏图册》中的大封民国认同	124
四	大理王朝至明清时期的白人与九隆族	129
五	庄蹻复出于“方志”之中	137
六	西北边缘:三苗与无弋爰剑受冷落	142
第八章	北疆与南疆的英雄祖先记忆	149
一	汉晋以来北方华夏边缘的炎黄子孙	150
二	北朝、隋、唐时的炎帝子孙	156
三	南方的廩君、盘瓠子孙	158
四	盘瓠与盘王子孙——本土观点	165
五	南方的蚩尤祖先	169

六	另类历史:南方的“弟兄祖先”祖源记忆	171
七	黄帝子孙与南疆“汉人”	173
第九章	华夏社会边缘的英雄祖先记忆	179
一	家族谱系之文字记忆	183
二	文字谱系记忆的民间化与族谱文类之兴	186
第十章	近代中国炎黄论述	189
一	国族历史建构初期的炎黄子孙记忆	191
二	“英雄徙边记”与近代中国边疆史	194
三	新文类“民族史”下的华夏边缘再造	201
四	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	204
第十一章	多重边缘交会:索土司的祖源	209
一	瓦寺土司的家族史	210
二	多种边缘之交会	214
三	三种土司家族史的文本解读	219
四	历史记忆下的个人动机、意图与情感	223
结语	历史中的表征与本相	231
一	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	234
二	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情节	235
三	边缘、异例、断裂与符号	238
四	符号与结构之间:模仿与攀附	240
五	反思与反省的历史	244
参考书目		247
索 引		263

前言：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

在中国近代学术中，“中国民族起源”是一项很受重视的课题。由历史与神话研究中的“古华夏部族起源”，到考古学上的“中国文明起源”，到民族学与人类学者所称的“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至于结合古人类学与生物遗传学等多项学科的“中国人的起源”等等之研究，皆与此问题相关。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此论题学者们又有另一种思考：这种学术探求与因此建构的“历史”，是否为在某种群体认同下人们的集体想像？如此使得这问题更复杂，不只涉及“过去发生的事实”，也涉及“人们对过去的想像与建构”。

过去十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于“华夏边缘”的历史与人类学探索。1997年，我出版《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由人类生态、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面向，探讨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同时在1994—2003年之间，我多次利用寒暑期，在川西地区进行羌族田野研究。从文献与田野两方面研究古代与当今羌族，2003年我完成《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在这本著作中，我以—个古老的华夏边缘——羌族——来说明华夏的成长历程，以及推动此成长历程的社会与文化微观过程。这可以说是以更具体、系统化的研究，来说明华夏及

华夏边缘的本质及其历史变迁。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的研究旨趣愈来愈清晰:从一个新角度来看此问题,“中国民族的起源”不完全始于一个古老的“过去”、一个“核心”,而更重要的“起源”发生在“华夏边缘”人群间的一些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化。

这样的认知,部分因我在中研院参与主持一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研究计划。这个主题计划由语言学(王士元院士主持)、生物遗传学(李文雄院士主持)、历史学与人类学(王明珂主持)等分支计划所构成。虽然,这个研究计划由于研究人力不足,以及三个主要分支学科间的交集不足,只进行了两年(2001—2002年)。然而我因此得以跳脱一些细微枝节的研究,而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问题作较全面的、更具深度的思考。

另外在羌族研究中,我体认到当地普遍流传的“弟兄祖先故事”是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一种本土历史建构模式。如此体认,让我反思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实上是另一种历史建构模式——英雄祖先历史——之产物。因而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主持了一项“英雄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在此计划中,我与宝力格教授(Uradyn E. Bulag)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共同研究古今流传于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各种“英雄祖先历史”(或“弟兄祖先历史”),探讨它们所流露的各地人群之“我族”认同情感与情境。在最近四年内,我在这两项研究计划下写了几篇相关论文,或已发表,或未发表,这本书便是在这些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补充与阐发。因此,本书可以算是“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题计划与“英雄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作一新诠释。因此,首先,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起源”研究作一简单回顾,来说明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积以及研究观点的转变趋势。

一 中原核心、多元一体、想像社群

清末以来,学者们对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曾有热烈探讨。虽然参与讨论

者中不乏当世巨儒，然而在今之学者看来，其学术性并不显著。他们的论述，常集中在“黄帝”或“炎黄”身上，以此华夏血缘的“起源”为“炎黄子孙”之中国国族立本。他们论述中的华夏始祖为黄帝，或炎帝与黄帝，并争论“黄帝”究竟来自于黄河流域、北方草原，或来自于西亚。他们也争论在历史上哪些民族及其后裔为“黄帝子孙”，以及孰为黄帝嫡传、孰为黄帝庶子之后^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学界有“黄帝为自西亚东迁的巴比伦某部族长”之说。这是“中国民族西来说”的一种论述，当时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就是在中国也有许多一流学者附和此说^②。

无论如何，以黄帝或炎黄为起始的“中国民族起源”历史，难以说明为何此国族中包括满、蒙、藏、回等民族。后来，在比较具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对此问题作了补充。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者们，不强调黄帝、炎帝等“华夏始祖”的个人血缘传承，而将他们视为一个个“民族集团”的代表性领袖人物。如在新的史学与民族学概念下，黄帝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团首领；炎帝则被认为是同一民族集团中曾与黄帝争胜的另一支族首领，或被认为是另一民族集团之部落长。民族学的图腾说也被用来支持这些上古“历史事实”，如黄帝等被认为是“龙”图腾的部族，相对于东方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部族^③。无论是傅斯年所主张的“夷夏东西二源说”，蒙文通的中国“上古民族三系说”，徐炳昶所主张的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或孙作云所称“蛇、鸟、猪、鳖四部族”之说，皆以各民族集团的战争与融合说明中国民族（包括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之形成过程，同时也说明在此国族中孰为战胜者之后裔、孰为战败者之后

①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 卷，1997，页 1—77。

② 蒋由智：《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

③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4；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蒙文通：《古史甄微》，台北：商务印书馆，1933。孙作云：《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中国学报》3 卷 3 期，1945。黄石林、石兴邦：《龙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 94—102。